

書 評

宋 家 復^{*}

Cong Ellen Zhang（張聰）

Transformative Journeys: Travel and Culture in So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xv+301 pages. ISBN 978-0-8248-3399-2

本書是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張聰的新作，根據她 2003 年博士論文「宋代的旅行文化」（*The Culture of Travel in Song China (960-1276)*）改寫而成。張聰出身天津南開大學，赴美進修主要師從中國史資深研究學者伊佩霞（Patricia Ebrey）教授，在華盛頓大學（西雅圖）獲得碩士與博士學位，曾經與其他華人學者協同編輯介紹美國漢學研究中國思想文化概況的中文論著，個人也已經出版單篇英文宋代歷史論文若干。本書除了〈導論〉與〈結論〉之外分為八章，不含註解與書目的正文計 210 頁，是一部力圖探討宋代旅遊與文化關係的專書。

〈導論〉以范成大（1126-1193）和鄒定（1113-1170）為例，說明宋代「士人」（*literati*）旅行遊歷的廣度與頻繁度都令人驚訝，之前學者雖然並不是完全沒有注意到這方面的歷史現象，但是尙未能將之作爲研究焦點。本書

2012 年 11 月 13 日收稿，2013 年 1 月 7 日修訂完成，2013 年 1 月 31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Sung Chia-fu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則檢驗宋代旅遊的庶務、手續、儀式以及旅途中各式各樣的菁英社會文化活動，以期能照亮宋史研究的三個面向：一、帝制政府在動員暨定期搬遷國內菁英分子這事上所扮演的角色，二、頻繁的搬動對於這些遷徙者之地位與認同所造成的衝擊，三、旅遊者的觀景活動（sightseeing activities）之於地方史學的演進以及宋代中國的社會文化搥成有何影響。

第一章「路過的人生：旅行與宋代文人」，首先概述中國歷史上文人旅行的發展，直到唐宋時期，隨著科舉考試體系以及中央主控的文官人事制度的建立，新的士人階層出現，長途旅行成為這個階層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士人的旅行主要可分三類。第一、「隨侍」，亦即隨同家族成員的旅行，涉及的是宋朝官員是否攜家帶眷為官赴任，以及政府對此現象的逐漸開放態度與因應措施。第二、求學或應試，衆多公私書院建立於全國各地，學生們追求本鄉以外的名校名師，加以離鄉參加三級科舉考試，估計在十三世紀中葉，全國有四十萬舉子在同時朝著區域中心或京師路途奔波。第三、「宦遊」，宋朝政府擁有上萬名公務人員，其中三分之一左右是散居在外的非京朝官，若以地方行政單位數目及其所需任命官員員額估計，地方官員的總額更在六千到七千之譜；在當時的人事實務架構之下（中央直控、迴避本鄉以及三年任期常不滿），頻繁的赴任、離任、轉任，加上赴京告事、特別出差、政爭貶謫以及外交出使等等，都使得宋代官員經常在長期遷徙旅遊之中。作者最後以圖表說明了歐陽修、王安石、洪邁、陸游與范成大五人的宦遊歷程。這五人的旅途經驗和遊記詩文，也構成全書的基本引證資料來源。

第二章「旅行的基礎結構：水路與官道」，指出宋代中央與地方政府皆優先致力於交通聯絡系統的建設與維護，主要為了因應成千上萬學子與仕人的需要、京師食糧供應、北方與西北邊境軍事活動的補給以及政府人員錢糧物品的調動。根據學者 Mark Elvin 等人的研究，宋代水陸交通較前代發達，相關的因素有四：造船技術進步、河海航行技術改善、建都開封促使西北交通系統必要擴展、運河的修濬與維護。不過，這章中作者特別著意的，乃是宋代士人在旅途中對這些硬體建設（如官道的里堠制度）的再現（representation）與經驗（experience），以及隨之發展出的自我感（sense of self），引用宋人的詩歌、遊記、軼聞小說（河神龍王祈禱），點繪出旅行之於宋代士人的情感與心理效應（辛苦、訝異、倦怠、思鄉、憂懼、抱怨

等等)，這些水路「官道」上的經驗感受，也正是宋人對「仕途」的經驗感受。

第三章「準備出發：文書工作與程序」，說明官員上任、轉任等相關的旅行程序與儀節。首先到禮部報到並取得告身與黃牒，這兩份關鍵文件由官告局監督書鋪製作，以便預定報到官署可以辨認來者確定為真，在民間有時甚至成為具抵押價值的憑據，雖然政府禁止。新受命官員也會得到禮部頒給的歷紙，亦即過去直屬上司考核政績的紀錄卡。這些文件齊備，就可以在禮部領取前任理應已經交回的官印，以及其他依新職務品階位置所必備文具皮袋等。下一步是御前朝謝，宰相府邸的堂謝，一方面朝廷正式頒授任命，另一方面受者表示感謝與努力不辱使命，至於其他的資深同事謝啓，友朋之間的酬酢，自不待言。若干儀節常態之外的特殊狀況，例如皇帝於朝謝失態、賄賂方得堂謝、因病請假、貶謫一再謝啓，亦時有所聞。宋代對官員準時赴任有嚴格規定（一年內可展延三個月），遲到需受罰，出發可預訂船期（尤其南宋以船運為主），但即使如此，旅途的不確定性仍高。

第四章「宦遊的政府協助：護衛、交通工具與住宿」，主要根據南宋時期《慶元條法事類》的記載，宋代官員旅行，是可以得到地方政府依行者官位高低，派遣成比例數量的兵卒護衛陪同協助。基本上官方買單，他們既是警衛、也是挑夫，有時還兼信差。行李超載、役使兵卒不當的例子不時出現。至於交通工具，則以舟車鞍馬為主。舟可以是官船或租用民船，仍是依官職大小派用，途中常需換船。騎馬在宋代除旅行必須之外，另外附有文治時代官人威儀、與外族爭雄的象徵意義；士人騎驢出遊在宋代，則輝映前代天才詩人李白以及謙卑自持的態度。轎子（或肩輿等名）在效率與役使人力上都容易引起爭議，但在宋代及之後確實普遍使用，是勞力充足便宜、社會地位分化的表徵。旅途住宿的選擇可以是私人寓所、民營客棧、寺廟借宿，但最主要還是對官員和舉子開放的官方驛舍系統（在首都則稱督亭驛或朝集院），特點是公費、方便與地方官員打招呼，政府也易於掌握官員行蹤。基本上每縣皆有驛舍，但分布並不平均，位置也不見得便利。一天所行距離稱一「程」，約四十五至六十里，旅人們依此估計行程。宋代驛舍是由兵士經營，驛券由樞密院簽發，提供多方面服務，但只針對官員，不含胥吏。地方官負督管責任，是他們政績的重要櫥窗，亦為來往士人交際的場所，甚至題

壁詩文亦成雅俗，綜合構成士人自我認同的重要處所。

第五章「分離儀式：送別宴」，指出宋代頻繁的士人送別宴，乃是一個酒酣、賦詩和展現男性友誼的儀式性場合，來賓的地位與數目都被視為是主人與出行者的社會文化聲譽指標；從皇家到地方都有類似集會，有時還連續幾天甚至上路同行，所產生的詩、序在宋人文集中佔相當篇幅。

第六章「旅行者及其地方東道主」，則進一步指出送往迎來詩酒酬酢所構成的繁忙社交世界，維繫了友誼與人脈，但卻也構成了地方官員（或者旅行者本身）的沈重負擔，這種負擔既可以是心理上的，往往也是財務上的，這點由宋代相關敕令奏章討論明顯可見。濫用公使庫撥發的公用錢成為嚴重的官箴問題，就是例子。即使在政府各種薪津補貼的條件下，不少旅途中的士大夫仍然為財務憂心。

第七章「觀光與造跡：拜訪與銘刻地方」，首先指出宋人辨識認定「名勝」「山水」的方式有四個特徵：自然／文化／歷史／宗教諸因素混雜揉合、南宋偏重人文紀念超過自然環境、不限於經濟與文化先進地區、文化景點越多越引人入勝。宋代的旅遊論述與前代之不同，在於旅遊被視為道德修養的一環，更是增長見聞、學問精卓的必要條件。宋代士人訪問名勝乃是一種「文化朝聖」，是將自身置於歷史時空長流之中，與過往溝通，進而參與、留名的過程，遊記、詩文創作、題記、刻石，都要在這個脈絡中理解。宜陵的三遊洞、范成大 1177 年沿長江的旅行，都是這種名勝形成的例證。

第八章「菁英旅行、名勝與地方史」，則是以黃州在蘇軾謫居之後成為名勝的個案為例，說明來訪士人、地方官員以及地方文人三方面錯綜複雜的合作關係造就了一個新名勝的誕生。士人們的頻繁遊覽，也促進了對地方知識的需求與更新，南宋地理書如《輿地紀勝》、《方輿勝覽》以及眾多地方志於是應運而生，這點之前學者 James Hargett、Peter K. Bol 等人已有論列。

「結語」中作者簡短提到宋代士人頻繁旅行的現象為世上前現代社會（premodern societies）所僅見，只可惜並未見到進一步展開論證。換言之，大量旅行這個現象與現代性的關連本身就值得思考，而中國宋代這個前現代社會卻似乎擁有一個近乎現代的現象的意義為何？作者更是無意深入。這點本來無可厚非，但是衡諸近年來全球化的發展影響，學者們受當下時間與空間劇烈變遷的感受引導，才轉而對於歷史上的相關現象產生濃厚興趣，於是

舉凡旅遊文化、空間移動、文化場域等等課題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海內外的中國史、甚至更專精的宋史學界也勇於參與第一線的學術潮流，張聰博士的這本力作或許可以放在這個問題意識的脈絡來理解。從長遠學術累積的角度來看，一個問題意識當然需要不同時段區域的專攻者協助應用，希望累積局部成果有朝一日匯聚成為通達歷史見識；但是，如果深耕宋代士人宦遊細節的代價，是反而忘了追問他們與尋找西王母的穆天子、天台山朝聖的香客、深刻研究和記錄喀斯特地貌的徐霞客、¹乃至 2012 年大陸黃金週 7.4 億人次出遊的民衆，在「旅遊」與「文化」的本質上有何歷時性的差異？所謂「觀光客的凝視」是否真只是現代性的產物？²後現代式的遊牧自我認同為什麼不存在於幾乎總是在旅途中的宋代士人心態之中呢？那未免有「知古而不知今是謂陸沉」的風險。畢竟，旅行的意義正在於它不只是「空間的水平移動」而已，而是由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方」的系列意義生產活動。³回到這部書的標題《轉變性的旅程：宋代中國的旅遊與文化》，作者在「宋代中國」的部分可以說是克盡職責，讀者應該感激不盡；至於「旅行與文化」，若僅就士人（尤其仕人）文化而言，也不算文不對題；至於宋代官員這些頻繁的官道仕途旅程有何「轉變性」可言，放在一個長時期的士人文化史上來看，似乎學者們後續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不過，作者已經盡力，就結合旅行文學書寫與旅行實作歷史這兩方面的努力特別可喜，因此這部作品必將成為此後旅行文化研究不可迴避的進階金磚。

1 書中第七章開始其實有提到泰山朝聖與徐霞客的例子，可惜未能申論。

2 John Urry 著，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臺北：書林出版社，2007）。

3 關於「地方」的意義，請參考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

